

明代江南士人的抄書生活

陳冠至

摘要

抄錄書籍是古代藏書家蒐集圖書最常用的方法，即便是在雕版印刷普遍流行的宋、元、明、清等朝代，仍是如此。另一方面，歷代文人還把抄書當作讀書時幫助記憶的有效辦法，只要手抄一遍就可以加深印象，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手工抄寫不會因為雕版印刷的發明與普及而遭到廢止，既是求知自學、積累知識的基本手段，也是書籍製作和文獻整理的基本工作，更是古代典籍傳播和流通的主要介面。明代的圖書印刷事業雖已相當發達，但是許多書籍仍然得之不易，因此文士們非常重視抄書，蔚成時尚與生活特色。明代江南士人的抄書活動對於今日全民閱讀運動的啓發，不但可以注入新的力量，開發新的趨勢，更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區域文化命題。由於明代江南文士普遍喜歡抄書，彼此間互相借閱傳抄，不但保存暨流通古代典籍、傳播知識與文化、促進著述和創作、精進書法的藝術，甚至也可滿足自我癖好，成為文人生活文化的一種時代面向。

關鍵詞 (Keywords): 明代；江南；文人；抄書；生活文化

Ming Dynasty；Jiang-Nang；Literatus；Scribing；Lifestyle

陳冠至：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E-mail: dhau@ms35.hinet.net

一、前言

「抄書」或作「鈔書」，「鈔」字並非筆誤，反而「鈔」為本字，「抄」為俗字。^[1]根據明人解釋「鈔」字，云：「又如鈔，畧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曰：『鈔紙』。」^[2]而不論「鈔」或「抄」，皆指把別人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抄書便是如此。中國古代藏書家抄書的方式大致有三種：一為親自抄錄；二為僱人代抄；三為委託親朋好友或是家中僮僕代抄，這些方法都因人因書而異。^[3]抄錄書籍是古代文士在閱讀上一個重要的方式，也是藏書家在徵集圖書時最常用的手段^[4]，即便是在雕版印刷普遍流行的宋、元、明、清等朝代，仍是如此。因為手工抄寫的辦法簡單易行，只要有筆墨紙硯，便可操作；且在一般的狀況之下，並不需要他人的協助。另外，歷代文士還把抄書當作讀書時幫助記憶的有效辦法，只要手抄一遍就可以印象深刻，如此更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5]所以，手工抄寫並不會因為雕版印刷的發明與普遍使用而遭廢止，反而成為古代文士們求知自學、積累知識的一種方法，又是書籍製作和文獻整理的基本工作，更是傳播知識和流通典籍的主要方式。明朝的圖書印刷事業雖然已經相當發達，但是許多書籍仍然得之不易，因而藏書家仍然非常重視抄書，往往是以抄書做為充實藏書的重要手段。^[6]

在區域限定上，本文是以明代「江南六府」為研究範圍^[7]，包括地處長江下游的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興府與湖州府等太湖流域為限制。此外，本文所列舉的藏書家，其實也都是當時的知名文士，透過相關史料的爬疏整理，可以直接考察明朝本區文士崇尚抄書行為的時代面向，做為一種地域生活文化的部分探究與認知。

[1] 「鈔」字本義指以手指突入其間而取之，後乃謂竊取他人文字為「鈔」，而俗作「抄」。詳參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世界書局，1989.11），14篇上〈鈔〉，頁7。

[2]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11），卷1〈辨訛〉，頁3。

[3]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1），頁86。

[4] 有關明代江南六府地區藏書家的具體藏書事蹟，請參閱拙著，《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2.2）；《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6.10）。

[5] 周少川，〈元代的私家藏書〉，《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2，頁66。

[6] 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頁363。

二、抄書與江南士人的藏書生活

自從印刷術發明以後，書籍製作的成本雖然較之以往已經降低，抄書卻仍然是藏書家們補充藏書的重要手段，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有些書雖已雕版印刷，但由於空間的限制，交通不發達，因此無法買到；二、有些書雖可買到，但是質量低劣，錯誤百出，只好借版本較佳者抄寫；三、有些書在市面上買不到，只好向擁有者借抄。^[8]而明代藏書家崇尚抄書的原因還有許多，例如書籍流通地區相對集中，交通不便，導致購書困難，便是藏書家們重視抄書的一個主要原因。還有珍本、異本、孤本與罕見之本，既無刊刻，購置不易，只好抄而藏之。^[9]此外，還有藏書家的經濟狀況不佳，以及明代江南文士的「抄書癖」等，都是明代江南藏書家重視抄書的重要原因。

（一）圖書徵集的重要管道

以經濟上的因素來看，中國古代的書價，較之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柴米油鹽、布帛柴炭等開銷，一直是比較昂貴的。在宋、明、清各朝代裡，每冊書價均值米價三十斤以上。所以，一部五、六冊的書，其書價幾乎等於一個手工勞動者或是基層文職人員的一個月收入。因此，歷代的貧寒之士，只能透過借書與抄書的途徑，來解決讀書求知的需求。^[10]而書籍在明代，仍然是一種昂貴的商品。當時印刷術雖已盛行，往往卻因書籍難得，流傳稀少，「且或困於經濟，無力購置；更有秘本未刻，為世罕見，因此每多交換互借，輾轉傳抄。」^[11]明代江南的書價較前代雖已降低，但對於一般人來說卻仍然是相當昂貴，部分是因江南稅賦較重的緣故，所以手工業者或書商，往往把稅務方面的負擔轉嫁到書籍的售價上面。書價既昂，藏書家的經濟負擔必然也相對沈重，所以抄書便成為節省開支的理想聚書途徑。今人研究指出，明代自嘉靖以後，江南地區

[7] 對於「江南」的明確劃分，從事明清史研究的學人們，從來沒有一個統一的意見，即使抱持中間看法的學者，也有五府、六府、七府、八府、十府等說法。而當中唯一比較沒有爭議的，便是抱持六府說者，亦指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地區。明代的蘇、松、常、杭、嘉、湖等六府，在人們的心目中，已經是一個有著內在經濟聯繫和共同點的區域整體。因此，對於六府之說，學界的看法比較一致。

[8] 劉意成，〈古代私人藏書家對保存圖書文獻的貢獻〉，《贛圖通訊》，1983：4，頁33。

[9]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2），頁673。

[10] 袁逸，〈中國古代的書價〉，《圖書館雜誌》，1991：4，頁53。

[11] 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11），頁163。

藏書家之所以喜好利用抄書做為圖書徵集的手段，主要原因大致如下：^[12]

對於買書來說，就是做官人家，也要量力而行。一位七品芝麻官的每月薪俸，僅能買幾部平常之書而已。由此可見，要想成為一位藏書家也是不容易的事。……正由於書價的昂貴，並不是一般市民階層的人們所能承受的，所以，抄書不僅是藏書家聚書的重要手段，也是一般知識分子無力購求圖書，於是千方百計借書抄錄。同時，抄書也是一些為生活奔波或窮愁潦倒的書生謀生的手段。

雖說較之宋元時期，明代書籍價格已經趨向穩定與低廉，但是若與當時的物價比較，書籍仍然是屬於高消費的奢侈品，並不是一般百姓或者是低層官吏的微薄收入所能負擔的。在商品經濟不斷發展，皇權得到極大加強的社會背景下，以北京為例，明代民間抄書的原因大致為當時書價偏高、書坊刻書多舛誤、遭禁圖書多，以及稀見本在市場上不易獲得等原因。^[13]特別是江南地區，書價又高於他處，使得江南的藏書家在購書成本上的花費更顯龐大。正由於書價的昂貴，不是一般市井小民所能承受，所以抄書不僅是藏書家們聚書的重要手段，也讓一般的知識分子在無力購買圖書的情況下，千方百計地借書抄錄。而在這個時候，抄書也成為一些窮愁潦倒的書生謀生的手段之一，稱為「傭書」或「書傭」。^[14]

雖然抄錄可以說是歷代藏書家，特別是宋朝以前的藏書家獲取典籍的主要方法，但是到了明代，即便當時刻印的典籍已經流布天下，但以抄錄來收集圖書者卻仍不遜於他朝。^[15]更何況中國自古以來的典籍，流傳到明代已所剩無幾，為了搶救日漸散失的古人心血結晶以及傳承知識與文化，許多藏書家只好盡可能地蒐羅現存的古籍，透過抄錄與複製，做為豐富知識、保存古籍、傳播知識、擴大收藏的手段。^[16]再加上從明代中後期開始，江南社會瀰漫著好古、好奇與博古的文化氛圍，古籍的價值水漲船高，成為藏書家之間互相競尚而大肆標榜的收藏品。當時市面上的古代文集數量稀少，正如德清縣的文士姚士粦

^[12] 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85：1（1996.6），頁117。

^[13] 王建國，〈明代北京的民間抄書活動〉，《北京社會科學》，2004：3，頁44-45。

^[14] 同註12。

^[15] 張木早，〈中國古代私藏典籍的收集〉，《中國圖書館學報》，1996：4，頁45。

^[16] 陳益君，〈淺論中國藏書樓的歷史變遷與文化價值〉，載於：黃建國等主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391。

(1561-?)所言：^[17]

漢魏六朝文集，靖康間悉爲金虜輦去。今按通考所載，自宋玉至顏之推（531-約595），僅三十種耳！今所見惟董仲舒（前179-前104）、蔡中郎（蔡邕，133-192）、陳思王（曹植，192-232）、嵇康（223-262）、陸機（261-303）、陸雲（262-303）、陶靖節（陶淵明，約365-427）、鮑參軍（鮑照，約414-466）、謝宣城（謝朓，464-499）、江淹（444-505）、庾開府（庾信，513-581）十餘集。

而當時古籍價格之高，也正如嘉興李日華（1565-1635）所云：「鄰人持示宋板《太平御覽》一百本，余亡友吳公甫物也，其值百金」，^[18]以平均值計算，一冊值錢一兩銀子，這個數字在當時的確相當昂貴。由於當時古籍在物以稀爲貴的原則之下，藏書家想要購買，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這對一般藏書家的經濟狀況來說，不啻爲一種相當沉重的負擔，甚至幾乎是無力承載的。

正因如此，有些藏書家由於家貧無力購書，只能倚賴借抄他人的藏書而成「家」。^[19]於是，明代江南的藏書家在圖書的徵集上，採用抄錄的辦法更顯普遍，他們大多認爲抄錄的確是大量增加圖書的有效辦法。李日華又說：^[20]

鏤板書始於楊行密（852-905）、孟昶（919-965），而南唐爲盛。蘇子瞻（蘇軾，1037-1101）手抄《漢書》，自謂貧兒暴富。

他們是以前輩抄書的典型，做爲自己大量增加藏書數量的崇拜對象。既然承認抄書可以「貧兒暴富」，也就是認爲抄書在經濟條件比較拮据的狀況下，的確是獲得大量藏書的唯一辦法。所以，明代江南的藏書家，普遍崇尚以抄錄的方式做爲藏書徵集的主要辦法之一。

以抄書做爲圖書徵集的主要方式，對明代江南地區經濟較爲困乏的藏書家而言，確實是既流行又有效的方式。吳縣文人顧德育（1503-?），「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21]長洲杜璠，「聞人

[17] 明·姚士粦，《見只編》（臺北：新文豐，1985.1），卷上，頁67。

[18]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12），卷2，頁105。

[19] 劉尚恒，〈樂宜偕衆，書不藏家——再論我國古代私家藏書的流通〉，《四川圖書館學報》，1992年第4期，頁73。

[20] 明·李日華，《恬致堂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1.10，據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卷36〈書後漢書後〉，頁5-6。

[21]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據國家圖書館藏善本影印），卷116〈世隱顧子武先生祖辰傳〉，頁54。

有異書，輒走求之，期以必得。得則手自繕寫，祁寒盛暑，不離佔畢。」^[22]同縣的陸師道（1511-1574），致仕歸後，「益肆力於學。其學自九流、七略、稗官、黃衣之屬，亡所不窺。手抄典籍，後先積數百千卷，丹鉛儼然。」^[23]錢塘藏書家虞淳熙（？-1621），「以耿介見嫉，削職歸隱回峰別業，曰：『讀書林』。力不能購異書，與弟閉門鈔書，晝夜不止，有武庫行秘書之目。」^[24]如此看來，因家貧而以抄錄來蒐集圖書、增加庋藏量，當是明代江南的藏書家所慣用的方式。而華亭文人陳繼儒（1558-1639），也因個人經濟所限，遂以抄錄做為聚集典冊的主要途徑。他告訴友人說：「某山澤無所嗜好，好林澗之游。家貧不能買書，往往手日抄寫。」^[25]又如明末清初崇德藏書家呂留良（1629-1683），也喜好以抄書來充實自己的藏書。他自稱：^[26]

室中所藏，多所未盡，孟浪泛游，實為斯事。至金陵見黃俞邵（黃虞稷，1629-1691）、周雪客（周在浚）二兄藏書，欣然借抄，得未曾有者幾二十家，行吟坐校，遂至忘歸。憶出門時柳始作綿，今又衰黃矣！

總之，明代江南的藏書家，經常是以抄書的方式來增加自己的藏書數量，甚至成為個人蒐集圖書的主要方法。

藏書家在圖書的徵集上之所以會採用抄錄方式的原因，除了經濟條件無法支應外，還有就是在買不到書與版本考量等因素促使下而進行抄書，也就是說，儘管印刷術的發明和推廣已經為圖書生產帶來巨大的進步，但是許多不傳的孤本、珍籍，以及一些無法購得的圖書，仍然需要倚靠抄錄的方式才能獲得。^[27]另外，由於明朝中央在統治上採取高壓政策，為了箝制士人的思想，諸如官府文書以及朝廷禁書等部分典籍，更不是一般人所能收藏的，例如杭州文士馮夢禎（1548-1605）曾經供職翰林，「初入館，從相知家乞得舊館課本二百餘帙，繕寫珍藏以為式，請告後輒遺棄之。」^[28]通常說來，這類圖書是官府特

[22] 明·文徵明，《文徵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30《杜允勝墓志銘》，頁709。

[23] 明·王兆雲，《皇明詞林人物考》（臺北：明文書局，1991.10），卷8，頁342。

[24] 清·丁申，《武林藏書錄》4版（臺北：世界書局，1980.10），卷中〈虞長孺僧孺兩先生〉，頁49。

[25] 明·陳繼儒，《白石樵真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卷1〈答費無學〉，頁33。

[26] 明·呂留良，《呂晚邨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3），卷1〈答張菊人書〉，頁32。

[27] 楊柏榕等，〈關於中國古代藏書家評價問題〉，《四川圖書館學報》，1991：2，頁62。

[28]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44年黃汝亨朱之蕃等刻本影印），卷2〈刻歷代詞林館課序〉，頁4。

有的，市面上並沒有出版販售，一般人想要收藏，或許能藉由從仕入館之便而抄得之。但明代朝廷設有禁令，嚴令官府文書不可任意洩露，所以，馮夢禎下野以後，為求明哲保身，便宣告「遺棄」了，屬實與否則不得而知。上海王圻，也曾經藉由居官之便，「從臺臣之後，凡六曹文牒暨諸先賢奏牘，咸口誦手錄，得什一于千百。」^[29]王圻不敢直接抄錄官府的文書，表明乃是聞自都察院內諸老所言，口授而手錄以得之。所以，對於這類書籍，藏書家若想擁有，更是惟有仰賴抄錄的手段祕密進行，才能羅致。

(二) 保存古代典籍

文人的抄書行為，往往可以保存古代典籍的一部分，或全部內容，甚至成為原書的複製品，對於傳承古代的知識與文化，居功厥偉。明代江南藏書家於抄書時對書法的講究，皆是盡量要求字體工整清晰，避免跳行、跳頁、錯字與訛誤等。「洪武中，松江孫道明（1297-約1376），屠兒也。每借人書坐肆中，且閱且寫，密行楷字，積寫千餘本也。」^[30]孫道明是明初華亭縣的藏書家，喜好抄書，以此法積累的書籍，數量相當可觀，所藏「手鈔書數百卷，皆小楷齊截。」^[31]其實，文士們在抄書時，對於字體的美惡與正確性，大多相當注重，其關鍵主要在於抄書者的學術水準，是否可以在抄寫時發現錯誤而加以訂正來決定抄本的好壞。明末秀水知名文士曹溶（1613-1685）認為：^[32]

抄本之書，訛以傳訛，至有不可模寫字句。此全仗抄手之淹通，一一改正，而較勘良朋，幸無靳濡筆焉。

名家抄本，通常在字體的工整或美觀上，都具有一定的水準，這或許是許多藏書家同時也是書法家的原因之一。有些明代的藏書家，甚至因為所抄之書精審美觀而為世人寶愛，成為享有盛名的抄書家。他們的抄書活動，也的確為明代圖書的保存，做出亮眼的貢獻。^[33]

前述明初孫道明的抄本，因字跡娟秀為人喜愛，甚至傳到明代中後期，更

[29]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凡例〉，《續文獻通考》（北京：現代出版社，1986，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頁1。

[30] 明·郎瑛，《七修類稿》（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8），卷40〈寫字誦經〉，頁489。

[31] 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4版（臺北：世界書局，1980.10），卷2〈孫道明明叔〉，頁67。

[32] 明·曹溶，〈輯書大意〉，《學海類編》第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頁7。

[33] 王偉凱，〈明代圖書的國內流通〉，《社會科學輯刊》，1996：2，頁108。

顯珍貴。後來同縣的知名文士何良俊（1506-1573）也指稱：^[34]

孫道明家於泗涇，乃一市井人也。在勝國時，日唯以抄書爲樂。其手抄書幾千卷，今尚有流傳者，好事者以重價購之。

可見藏書家在抄書時，對於書法的考究，也是具有實質上的利益存在。除孫道明外，根據清人葉德輝（1864-1927）的總結指出，明代江南地區的諸家手抄本當中，最爲後世藏書家所寶愛者，還包括無錫藏書家姚咨（1495-？）的「茶夢齋」，以及秀水藏書家曹溶的「倦圃」等諸家，「皆竭一生之力，交換互借，手校眉批，不獨其抄本可珍，其手蹟尤足貴。」^[35]清人孫從添（1692-1767）也稱讚許多明代江南地區的抄本之精者，如秀水文士項元汴（1525-1590）之「俱好而多」，以及華亭陳繼儒與嘉興李日華等，「皆有抄本甚精」。^[36]由此可見以上諸位，皆爲明代江南的著名抄書家。

當然，明代江南的抄書名手絕非僅止於上述諸家而已，再據《藏書紀要》所列明代蘇州藏書家喜好鈔書且抄本頗精者，尚有朱存理（1444-1513）、錢穀（1508-1572）、錢允治（1541-？）、吳寬（1435-1504）、柳僉、吳岫、王世貞（1526-1590）、葉盛（1420-1474）、趙琦美（1563-1624）、葉樹蓮、王寵（1494-1533）、文徵明（1470-1559）、陸師道、祝允明（1461-1527）、沈周（1427-1509）、史鑑（1434-1496）、邢參、楊儀（1488-？）、楊循吉（1458-1546）、顧元慶（1487-1565）、都穆（1459-1525）、俞貞木（1331-1401）、趙宦光（1559-1625）、文彭（1489-1573）、孫艾（1452-1526）、馮舒（1593-1648）、馮班（1604-1671）、毛晉（1599-1659）、陸貽典（1617-？）、錢曾（1629-1701）、毛扆（1640-？）等人。^[37]今人研究指出，在明代蘇州產生的衆多著名書手裡，像朱存理、錢穀、錢允治等人，他們抄寫的書籍品質精美，舉世同珍，例如崑山文士歸有光（1506-1571）便曾經稱讚葉盛遺留的手抄本云：「文莊公（葉盛）書，無慮萬卷。至今且百年，獨無恙。繙閱之餘，手跡宛

[34]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11），卷16〈史十二〉，頁136。

[35]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12），卷10〈明以來之抄本〉，頁13-14。

[36] 清·孫從添，《藏書紀要》（臺北：新文豐，1984.6），第3則〈鈔錄〉，頁14。

[37] 同註36，頁16-17。此外，關於明代蘇州著名鈔書家，亦可考見：李清志，〈明清著明鈔書家表〉，《古書版本鑑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9），頁265-270；劉兆佑，《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臺灣書店，1997），頁62-64。

然，爲之敬嘆云。」^[38]甚至流傳到清代中葉，仍然是當時收藏家爭相寶愛的對象。^[39]而今日明抄本更顯珍貴，著名者有吳抄（長洲吳寬「叢書堂」抄本）、葉抄（崑山葉盛「賜書樓」抄本）、文抄（長洲文徵明「玉蘭堂」抄本）、沈抄（吳縣沈與文「野竹齋」抄本）、毛抄（常熟毛晉「汲古閣」抄本）、錢抄（錢穀叔寶抄本）等諸家。^[40]

此外，明代江南喜好藏書的文士們，也經常以借抄、傳抄的方式來蒐集圖書，而在抄錄的同時，卻也保全了許多即將散佚的古代圖書，對於古人智慧結晶的完整傳續，功不可沒。吳縣文人朱良育，「明初之藏書者也。」^[41]清人葉昌熾（1849-1917）指出：^[42]

張刻《封氏聞見記》有朱良育跋云：「昔友人唐子畏（唐寅）見借，特以不全爲恨。近又於柳大中（柳僉）借鈔前五卷，庶幾爲全書，古書之難得如此！富室子弟，積書萬卷而不讀，亦獨何心哉？」觀此，則先生惜書之癖，不減安愚（柳僉），且於唐、祝（祝允明）諸公，皆有苔岑之契也。

當時朱良育與唐寅、柳僉、祝允明等江南文士，因爲彼此的抄書癖好，進而結爲同志，互相傳抄，對於地方學術的揚摧，以及古代典籍與文化的傳承，更顯重要。另一方面，文士們在抄錄時若發現自家所藏有脫漏缺損的情形，還可藉由這個機會補完全書，達成保存古籍完整的歷史文化作用。歸有光便是如此，他說：「余家有《星槎勝覽》，辭多鄙蕪。上海陸子淵（陸深，1477-1544）學士家刻《說海》，中有其書，而加刪潤。然余性好聚書，獨以爲當時所記雖不文，亦不失真，存之以待班固（32-92）、范曄（398-445）之徒爲之可也。凡書類是者，予皆不憚讎校，卷帙垢壞，必命童子重寫，蓋余之篤好于書如此。」^[43]

秀水土人沈啓原（1526-1591），也好藏書，「上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古

[38]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臺北：源流出版社，1983.4），卷5《題金石錄後》，頁113。

[39] 邱澎生，〈明代蘇州營利出版事業及其社會效應〉，《九州學刊》，5：2（1992.10），頁142。

[40] 《中國出版簡史》，頁164。現存明代藏書家抄本名稱亦可參見陳宏天，〈現存明清抄本及其特點〉，《古籍版本概要》（臺北：洪葉文化，1992.10），頁116-119。

[41] 清·顧廣圻，〈殘本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百宋一廬賦》4版（臺北：世界書局，1980.10），頁19。

[42] 《藏書紀事詩》，卷2，頁102。「苔岑之契」，指志同道合。

[43] 《震川先生集》，卷5《題星槎勝覽》，頁115。

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借之儲書家，務繕寫完好乃已。」^[44]購買以外，沈氏以抄書做為求書的重要手段，特別是針對所藏的斷簡殘編，凡有缺略者，盡量向人借得，並要求抄寫的品質必須完善，以全其真。觀此，明代江南文士透過嚴謹的抄書行為來達到保存中國古代典籍完整的目的，因而發揮出的歷史文化功績，在沈啓原的身上，可謂得到最佳的詮釋。

(三) 抄本在版本與校讎上的價值

明代中期開始重視手抄本，除因當時藏書界普遍崇尚奇祕的風氣以外，實際上還有一些具體的生成因素。首先，由於當時刻印書籍過於盛行，特別是活字印刷技術的改良運用，使得書籍的刻印速度加快很多，大量印刷書籍雖然應付了市場的需求量，但是在質量的控制上，卻也讓文士們大為詬病，如非訛誤濫改，就是字跡模糊難讀，間以劣墨惡紙充當原料，開卷異臭撲鼻，斷頁又多，使人難以忍受。上海文士陸深即認為當時抄本重於刻本，實肇因於坊刻之謬惡，以致古書多重手抄本。他說：^[45]

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為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夫印已不如錄，猶有一定之義，移易分合，又何取焉？茲雖小故，可以觀變矣！

由於時下書籍印本日多，版刻良莠不齊。而手抄本，特別是名家抄本，必為世所罕見的書，或是傳錄較好的版本，都是善本^[46]，足以正本清源，修改當時市面上刻本的謬誤，使學人不致誤墮其害，故手抄本的價值，為喜好從事校勘的藏書家們所重視。由於抄本是文士們殫精竭慮的辛勤之跡，今日學者對現存手抄本也多半給予較高的評價，認為其中不乏孤本與善本，為歷來的藏書家和學者們所重視。^[47]

其次，在明代中期江南文壇開始尚古好奇的時候，舊時的精校精抄本，也都成為文人競相追逐的對象。陳繼儒認為：「抄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斷璧殘珪。」^[48]抄本書之所以會如此受到歷來藏書家的推崇，大致有以下幾

^[44] 明·焦竑，《澹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5），卷33〈陝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狀〉，頁540。

^[45] 明·陸深，《金臺紀聞》（臺北：新興書局，1974.7），頁4。

^[46] 呂彼得，〈談善本書〉，載於：氏著，《版本目錄學論叢（一）》（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年.8），頁19。

^[47] 蕭東發，〈印刷術發明後的抄寫本書〉，《贛圖通訊》，1983：3，頁52-53。

^[48] 明·陳繼儒，《岩棲幽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118（臺南：莊嚴文化，1995，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影印），頁14。

個原因：一、抄本中存有孤本、珍本與秘本；二、寫本中存有名家手澤；三、抄本中存有影宋本（或傳錄宋本）；四、抄本中存有祖本（或傳寫初印本）；五、寫本中若干並無刻本（只有抄本流傳，刻則有失舊觀）；六、抄本中有些不知原本（或真本、舊刊）之所在；七、寫本中有些傳本甚少；八、抄本中有些比校刻本內容為多^[49]，如秀水藏書家曹溶，藏有嘉靖年間所抄《皇華集》五卷，其內容甚至比當時流通於市面上的刻本多了四分之一，更可見其學術價值之所在。^[50]凡此種種，都是抄本受到文人重視的主要原因。特別是明代江浙地區的藏書家，喜好抄書的人很多，不但以之為求書的重要途徑，更是為了方便自己的閱讀、整理與利用。抄書必須覓得較佳的底本，抄寫的時候也要非常認真，而抄完以後，還要再三核對，故手抄本質量很高，許多都為人寶愛。^[51]綜言之，明代私人抄書的特點有三：一是抄本內容以秘本、異本與善本為主，且多半是指宋元刻本與抄本；二是明代抄本的書法水準較高；三是明代「影抄」的技術相當發達。^[52]今人研究指出，明代抄本對於古代文化的流傳，確實發揮出重要的作用。^[53]

由於文壇的影響，使得江南的藏書界也沉浸在一片尚奇崇古的收藏風氣當中，文士們若能抄得異書，更可炫耀於同志之間，成為風雅的標榜。陳繼儒便因抄得奇秘之書，喜云：^[54]

宛丘趙期頤以書名世，得之吾衍（1272-1311）者為多。吾衍所著書有《尚書要略》、《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通書》、《授神契》、《說文續解》、《石鼓咀》、《楚文音釋》、《閒中編》、《竹素山房詩》。余又抄得《閒居錄》一卷。

陳繼儒的學生李日華，也以抄得奇書炫人，自稱：「錄得楊君謙（楊循

[49] 封思毅，〈歷代寫本概述〉，載於：吳哲夫主編，《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臺北：中國圖書館學會，1985.9），頁291-293。

[50] 葉樹聲等，《明清江南私人刻書史略》（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5），頁95。

[51] 韓文寧，〈明清江浙藏書家的主要功績和歷史局限〉，《東南文化》，1997：2，頁144。

[52] 影抄即是把可透影的紙覆蓋在底本上面，按照原來的字體，甚至連邊界格式等都依原樣摹寫，可保存古籍的原貌。

[53] 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臺北：洪葉文化，1994），頁145。

[54] 明·陳繼儒，《妮古錄》（臺北：新興書局，1976.8），卷3，頁7。

吉)逸詩數首,乃《南峰稿》所無者」^[55]高傲地向世人宣告自己的高雅與博學。受到這股風氣的影響,當時文士們非常時興抄錄奇古。如李日華的同學陳宏策,亦宿懷此癖,日以抄錄秘冊為課,李氏云:「余友陳白石(陳宏策)生平無他嗜,嗜書,少與余同研席,即有窮盡天下隱文祕錄之意,遇即抄撮,無間寒暑。」^[56]而李日華的學生李于然,也是如此,「營聚異書以自排蕩,中多借帙,遇新異即為撮抄,迨脫,歸盈簏矣!」^[57]

此外,文士們在抄書時,還可以一邊抄錄,一邊校讎,改正底本的錯誤,使得抄本的品質更精,這對護書惜書彷彿頭目的藏書家而言,更是趨之若鶩。長洲藏書家鄒亮(1406-1454),「為人謙謹,酷嗜書,積至千餘卷,手自鈔錄讎校。」^[58]所藏典籍的數量固然重要,品質也必須講究,才可提升自我的學術水準,不致淪為書賈之流。長洲錢穀,同樣熱衷校抄書籍。《明分省人物考》載其事云:^[59]

喜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遍謁藏書家,就而讀之。……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讎校至丙夜不休。

一邊抄錄,一邊校讎書籍,對他來說,是一生當中最感興趣的事,以致「聞有異書,雖病必強起,匍匐借觀,手自抄寫,窮日夜校勘,至老不衰。燒香洗硯,悠然自得。」^[60]崑山歸有光,也利用抄書的機會,借善本以進行校讎。其跋《金石錄》云:「至是,始從友人周思仁借抄,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校之。」^[61]透過如此嚴謹的校抄方式,所留存的版本必定最為精善。常熟文人秦四麟,亦好抄書與校書。他「夙喜藏書,從人得祕本多用行書好寫,篝鐙校勘,老而不倦。」^[62]長洲藏書家史兆斗(1576-1663),「性尤喜蓄書,所購率皆祕本,或手自繕錄,積至數千百卷。齋居蕭然,惟事校讎,或偶有所得,輒

[55] 《味水軒日記》,卷2,頁81。

[56] 《恬致堂集》,卷13〈陳四可非業序〉,頁34。

[57] 《恬致堂集》,卷18〈李于然辨烏餘撫題辭〉,頁26。

[58] 明·王鏊,《姑蘇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12,據明正德刻本影印),卷54,頁37。

[59] 明·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臺北:明文書局,1991.10),卷24〈南直隸蘇州府七〉,頁254。

[60] 明·陳繼儒,〈錢叔寶〉,《書畫史》(臺北:新興書局,1970.7,據明刻本影印),頁11。

[61] 《震川先生集》,卷5〈題金石錄後〉,頁113。

[62] 清·鄭鍾祥等,《常昭合志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藏清光緒30年活字本),頁24。

作小行楷疏注其旁，每卷皆有之。」^[63]長洲文柘（1597-1668），亦「嘗手摘二十一史，繕寫校讎，寓傷今弔古之懷」^[64]藉抄校來發抒鬱抑之志。以上諸人都癖嗜抄書，且在抄書當中進行校讎工作，並選擇善本做為參照，因此，不但使得許多孤本舊刻得以重見於世，也對古代典籍的正本清源與繆誤之改正，做出偉大的貢獻。

三、抄書與江南士人的學術生活

（一）流通典籍與傳播知識

在典籍流通方面，明代江南的文士除文會過從時的鑒賞品題與多人聚觀外，借閱的情形相當頻繁，大多是為校書或抄書。事實上，抄書是藏書家之間最常見的典籍流通方式，當時「得書不僅購訪已也，購訪以外，尚有傳鈔。」^[65]

藏書家以借抄來流通典籍打從明初即不乏其例，如朱存理和邢參，便以互抄為藏書流通之法。有一次朱存理向別人借得宋版《韻語陽秋》，便拿給邢參看，邢參立刻找人抄錄兩本，並將其中一本回贈給朱存理。錢曾誇讚兩人「嗜好之勤，互以鈔書為風流罪過，亦藝林美談也。」^[66]朱存理與楊循吉也是好友，因當時江南文壇正流行尚奇好古，「藏書家多以祕冊相尚，若朱性甫（朱存理）、吳原博（吳寬）、閻秀卿（閻起山，1484-1507）、都元敬（都穆）輩，皆手自鈔錄。」^[67]其實，這股藉由傳鈔以流通各家所藏的風氣，「實君謙（楊循吉）倡之也。」^[68]當然，這股風氣使得手抄本大大地風行起來，也讓一些遺卷孤本得以流傳後世。

到了明季，文人癖好抄書的熱潮仍未冷卻。常熟錢謙益（1582-1664）藏有朱存理的《野航詩集》，然非完本，缺漏部分無法於坊間購得。為補足全書，

[63] 清·汪琬，《堯峰文鈔》（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3月版，據林佶寫刊本影印），卷34〈史兆斗傳〉，頁7-8。

[64] 明·鄭敷教，《桐菴文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藏民國6年崑山趙詒琛刊本），卷1〈端文先生墓誌銘〉，頁51。

[65] 陳登原，《中國歷代典籍考》（臺北：五洲出版社，1968），頁387。

[66]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6），卷4〈韻語陽秋二十卷〉，頁165-166。

[67]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臺北：明文書局，1991.10），卷8，頁722。

[68] 同註67。

錢謙益只得四處打聽，向人借抄。他說明該書「今不傳。其文集手稿，余得之於錢允治功甫，錄其詩數章」^[69]才全其書。不過，此時江南的文士在抄書方面，已經有重大的突破。以往抄書無非靠一己之力，或求助於家人僮僕，有餘力者頂多倩請少數專業書手爲自己傭書，數量並不大。但到了明末，江南文士開始大規模翻抄古籍。《清代七百名人傳》記載常熟藏書家毛晉事蹟云：^[70]

好古博覽，構「汲古閣」、「目耕樓」，藏書數萬卷，延名士校勘。刻十三經、十七史、古今百家及從未梓行之書。天下購善本書者，必望走隱湖毛氏。所用紙，歲從江西特造，厚者曰：「毛邊」，薄者曰：「毛太」，至今猶沿其名。……推官雷某贈詩曰：『行野漁樵皆謝賑，入門僮僕盡鈔書』，蓋紀實也。

毛晉的抄書事業，僱用大量勞動力投入複製古籍的文化出版事業，創造許多就業機會，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文人大規模的抄書活動，特別是讓那些在封建社會裡幾乎沒有可能接受教育的奴僕與農工階級，也有識字與讀書的機會，對於知識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與毛晉同縣的文人趙琦美，以及崑山藏書家徐乾學（1631-1694），也是如此。趙氏「喜蓄異書，因而博極。得異本，命童子繕寫，日不下數手。」^[71]其《脈望館書目》，文中有注「大官人」、「二官人」者，「觀此，則是目當出於趙氏門僕之手。舊藏抄本《傳是樓書目》（徐乾學），亦有『太老爺』之稱。毛子晉（毛晉）家僮盡能鈔書，清門舊族，即僕隸亦皆能文。」^[72]可見明代江南文士的抄書活動不但對知識傳播產生巨大的影響力，甚至也感染到社會的底層。

爲了提高抄寫的品質，保存古書的原貌，毛晉不但講究紙張的品質，還發展出類似今日影印效果的「影宋鈔」方法，「用上等紙張摹在宋刻或元刻之上描成抄本，所有行款、字體等完全和原書一樣。」^[73]這種影摹的抄書技巧，此後便在江南地區大爲盛行。例如錢曾也曾經向人借書影抄，他說：「《達夫

^[69] 明·錢謙益，〈丙集·朱處士存理〉，《列朝詩集小傳》3版（臺北：世界書局，1985.2），頁303。

^[70]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5），第5編〈藝術·文學〉，頁323。

^[71] 明·姚宗儀，《常熟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藏明萬曆間刊本），卷14，頁20。

^[72] 孫毓修〈脈望館書目跋〉，載於：明·趙琦美，《脈望館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1），頁1490。

^[73] 《中國出版簡史》，頁164。

集》，予借林宗（葉奕）宋槧本影摹，族祖求赤（錢孫保）又從予轉假去，錄而藏于『懷古堂』。」^[74]雖然如此，明清之際江南文士抄書最為知名者，還是毛晉的「汲古閣」。當時「汲古閣」有抄書工匠二百名，抄了《極玄集》等很多書。而所抄之品精美無比，與原刊酷似，非細審之很難分辨，人稱「毛抄」。^[75]明代江南地區文人的抄書風氣至此已達鼎沸，而長洲文人許元溥與浙江餘姚黃宗羲（1610-1695）等人所創立的「鈔書社」，更為明代江南文士集體傳抄活動的最高潮。黃宗羲述云：「余與劉伯宗（劉城）及許孟宏（許元溥）為鈔書社。張登子（張陞）大會名士，孟宏與焉。是時藏書之家不至窮困，故無輕出其書者，間有宋集一、二部，則爭得之矣！」^[76]

除傳抄外，明末江南藏書家也開始和外地藏書家謀求藏書互通的約定。如錢謙益曾經和福建兩大藏書家閩縣徐爌（1570-1645）與侯官曹學佺（1574-1647）訂有藏書互通之約，《明詩人小傳稿》載：^[77]

萬曆己卯（七年，1579），（徐爌）偕其子（徐延壽）訪錢謙益，約以互搜所藏書，討求放失，復尤遂初（袤，1127-1194）、葉與中（盛）兩家書目之舊，能始（曹學佺）亦欣然願與同事，會亂旋卒。

其實錢謙益的「絳雲樓」藏書本來是祕不示人的，因逢回祿後，頓悟天下典籍聚於一人，可能一旦盡燬，古書恐將因而不傳。雖然錢氏這次與徐、曹二家藏書互通之約沒有達成，後仍「深懲其失，而與崑山徐氏（徐乾學）、四明范氏、金陵黃氏（黃虞稷），共申借書之約，以使古人心血，藉傳鈔而廣布，得以不墜。」^[78]後來，錢謙益甚至認為將藏書公開讓人使用，才是善保藏書之法。^[79]

由於明代江南地區的文士普遍崇尚抄書，流風所及，衍成文士間相互傳抄的方式，甚至訂下典籍流通約定，成為收集圖書的主要辦法。無可諱言，傳抄

^[74] 《讀書敏求記》，卷4〈高常侍集十卷〉，頁143-144。

^[75] 葉樹聲，〈明代南直隸江南地區私人刻書概述〉，《文獻》，1987：2，頁222。

^[76] 明·黃宗羲，《思舊錄》（臺北：隆言出版社，1969.10），頁17。

^[77] 清·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臺北：國家圖書館，1986），卷5，頁162。

^[78] 柳作梅，〈牧齋藏書之研究〉，《圖書館學報》，5（1963.8），頁79。

^[79] 錢氏云：「子又生子，孫又生孫，以守為守也。藏之名山，傳諸其人，以傳為守也。蔡中郎之盡歸王粲，廬山李氏之公人誦讀，此善守之法也。」見：明·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卷26〈黃氏千頃齋藏書記〉，頁996。

對於圖書的蒐集工作確實貢獻很大，但是，傳抄也有一些限制與難處。特別是當書的部帙過大時，傳抄便出現問題，例如《餘冬序錄》一書：^[80]

此書凡十三集，始終數千，條卷浩瀚，艱於流傳。……《宋史》〈儒林〉、〈文苑〉諸傳，其間名人鉅公所著書目，動以千百卷，今皆無傳，豈不以簡編重大之累乎？著述之家，可爲殷鑒。

一向以遺老自居的清初秀水文士朱彝尊（1629-1709），也曾經遇過這樣的情形。他想要抄宋本《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卻因部帙過於龐大，無法傳抄。於是他無奈的說道：^[81]

其備繹始終，兼該表裏，會粹編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觀其書，卷帙繁重，傳抄者難。

由此可知，能夠流通於文士間用以傳抄的書籍，首先在部頭上必須分量合適，否則便是空有寶山，卻無法供人開採。

另外，傳抄還有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那就是有時必須經過長時間的等待過程，才能輪到自己。無錫文人姚咨，便曾向同縣友人顧起經借《蜀鑑》抄錄，當時該書正在別處，無法借得。輾轉流傳，等到姚咨借得該書，竟然已經超過二十年了。姚咨說：^[82]

是編予得之羅浮外史顧玄緯（顧起經，1521-1575），玄緯得之兵侍鄧范東明（范欽，1506-1585）翁，翁又得之章丘李中麓（李開先，1501-1568）吏部。輾轉假錄，越二十餘年，予始得手鈔，凡六踰月乃畢。夙興夜寐，無論寒暑，蓋不知老之將至。

觀此，傳抄於時間性上，似乎比較無法精確控制，這與每位抄者的抄書速度有很大的關係。一般而言，傳抄書籍的流通之法通常有兩種：其一，當某位文士抄完以後，將原本再傳給下一個。此法利弊參半，其利在於可以分散抄寫時錯誤的風險，而弊在於曠日費時，抄書者必須等待很久的時間。另一種流通之法，也是利弊參半。當第一位文士抄完以後，原本則歸還主人，或再傳別

^[80] 清·盧世澐，《尊水園集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刻17年盧孝餘增修本影印），卷7〈餘冬序錄摘要〉，頁19。

^[81]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再版（臺北：世界書局，1989.4），卷42〈書林氏周易經傳集解後〉，頁509-510。

^[82]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12），卷16〈談藝六·蜀鑑〉，頁395。

人，更以所抄之本借給下一位傳抄者，下一位抄好的人又如法庖製，而上一位的抄本也可再借給其他的抄書者抄錄。如此廣泛流傳下去，其利在於傳抄時間迅速，不須等待太久；而其弊則在於若有錯誤，容易以訛傳訛。如嘉興李日華說：「陳白石（陳宏策）抄寄余陳眉公（陳繼儒）《求忠祠記》」^[83]，這類傳抄方式，便是第二種流通之法。到了明末，江南地區的文士間開始出現有組織、有社約的「鈔書社」。在秀水文士曹溶等人的大力推動下，很快就獲得江南文壇的熱烈響應。曹溶倡云：^[84]

予今酌一簡便法。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出所缺者，先經註，次史逸，次文集，次雜說。視所著門類同，時代先後同，卷帙多寡同，約定有無。相易則主人自命門下之役精工繕寫，較對無誤，一兩月間，各齋所鈔互換。此法有數善，好書不出戶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

曹溶的這種傳抄辦法，是中國自古以來藏書界的一種革新與創舉，利用這樣的方式，每位藏書家徵集圖書的途徑變寬也變多，對於江南地區藏書的流通，貢獻最多，而在古代文獻的保存上，更呈顯出特殊的重要意義。

此外，抄書往往也是藏書家儲存副本的方法之一。明代江南地區有些藏書家把抄書視為保存古代典籍的方法，為防止古籍久藏湮爛而致失傳，他們透過抄書，針對自家典藏的珍貴古籍進行複製，以防萬一。有些藏書家還把抄書當做一種樂趣，一種排遣孤寂的方法，甚至是日常生活的重心，把抄書定為自己每天必做的功課。而事實上，抄書也確實為一些還來不及付梓的圖書，提供千百份的副本，而這些副本分散在萬戶千家，即便遭逢戰亂兵燹，也不至於一散而俱散。^[85]仁和文人郎瑛（1487-1566），擔心自家所藏的珍貴古籍《宋濂詩》四冊年久不傳，於是抄錄備份，以廣流通。他說道：^[86]

苟或敗壞，千古埋沒。今特錄置于稿，則又傳遞一番，彰者眾矣，亦慊收藏者之情。

又如無錫藏書家秦柱（1536-1585），也是如此，凡「秘書奇策，購得輒

[83] 《味水軒日記》，卷3，頁186。

[84] 明·曹溶，《流通古書約》（臺北：興中書局），頁2。

[85] 劉意成，〈私人藏書與古籍保存〉，《圖書館雜誌》，1983：3，頁61。

[86] 《七脩類稿》，卷35〈宋戴遺詩〉，頁437-438。

加繕寫，侍史常數十人。」^[87]爲了保存家中的珍貴古籍，藏書家們付出不少心血，只爲成就與生俱來的一個歷史文化責任，即是善加保護書籍，以傳續古人的智慧結晶。

這樣的例子，在明代江南地區頗不匱乏。又如嘉興藏書家包檉芳（1534-1596），好聚書，「得之，則分命左右傳寫，手自摘錄，垂丙夜不休。客至，散帙縱橫，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了不爲異。」^[88]在包氏的藏書生涯裡頭，抄本佔所藏典籍的重要部分，令他徜徉其間，悠然自得。無錫藏書家顧宸，也是如此，「好博覽，務著述。蒐輯宋、元、明人遺文，凡金石秘本，靡不鈔纂。」^[89]明代江南地區的文士，喜好抄錄家藏或他人所藏珍本以爲副本，加以收藏，這種副本的功用不但可以分散古籍散佚的風險，還可繼續用來流通書籍，做爲傳抄時的底本。

傳抄風氣如此興盛，不難想見明代江南藏書家對於藏書的流通所抱持的態度較之他處顯得更爲寬容而富人情味。萬曆十七年（1589）夏天，常熟趙琦美曾向同縣秦四麟借觀《文中子元經》，秦四麟竟舉以贈之。爲回報秦氏，於是趙琦美告訴秦四麟最近獲得《錄異記》一書，秦乃當場向趙借閱該書。不數日，獲贈《錄異記》的趙氏爲讓秦氏無失書之憾，遂抄一副本回贈秦氏。^[90]觀此，江南文士之間以誠相待，禮尚往來，透過傳抄的方式，達成藏書流通的目的，本地典籍交流之頻繁，當是明代江南文士生活當中重要的一項活動與特色。

（二）文人的閱讀方式與「抄書癖」

在一般人看來，抄書可能是一項相當辛苦而乏味的工作。然而，明代江南文人篤嗜抄書，重視抄本，摹寫繕錄，至老不厭，經常是以身心性命，寄託於殘編斷簡之中^[91]，正是明代江南地區喜好抄書的文士們之最佳寫照。有些文士

^[87] 明·趙用賢，《松石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12〈中書舍人秦君汝立墓表〉，頁23。

^[88] 《藏書紀事詩》，卷3〈包檉芳子柳〉，頁176。

^[89] 清·吳德旋，《初月樓續聞見錄》（臺北：明文書局，1985.5），卷9，頁1。

^[90] 清·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8），卷4〈錄異記八卷〉，頁168。

^[91] 袁同禮，〈明代私家藏書概略〉，載於：洪有豐，《清代藏書家考》（香港：中山圖書公司，1973），頁80。

喜好抄書，一生不改其癖，然對所抄內容的偏好，卻是因時而異，隨著年齡的增長或生活的改變而產生不同的傾向。上海陸深自幼即興趣抄書，至老不廢，自稱：「予喜手抄書，方時少壯，夜寒鑪炙，不廢泓穎，今五十有六年矣！衰病垂及，乃喜抄藥方。予外病，病齒最先最甚，故抄方自治牙始。其次病目，而扶衰之方兼抄。」^[92]

其實，抄書之所以會成為文士們的癖好，與當時文人的閱讀方式有很密切的關係。明代江南文士讀書時，有些人為求專心凝注、加深印象，以及便於背誦，往往手抄口吟，邊讀邊抄。時日稍久，就成為一種閱讀習慣，使得讀書和抄書合而為一，相輔相成。吳縣文士王寵，「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經學，手鈔經書皆再過」^[93]，便是透過抄書來進行閱讀。還有人因為看習慣手抄書，竟至不願閱讀刻本。崑山文人顧天竣（1562-1628），「讀書多超乘之悟，然必使楷者手錄之，乃肯寓目。朱黃爛漫，標位精入，積卷軸至萬餘。意不少怠諸楷者，詣南都買金償之。」^[94]這真是一種奇特的讀書習慣，著實耐人尋味。

抄書除了可以讓人滿腹經綸外，有時還能藉此練就出一手好書法，對古代的讀書人而言，字跡娟秀與學識水準，兩者都相當重要。長洲藏書家朱存理，《明分省人物考》載其：^[95]

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為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群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

友人祝允明贈詩云：「書抄滿篋皆親手，詩草隨身半在舟。」^[96]名家抄本之所以為人重視，除因其人學富識廣外，書法的美觀也是為人寶愛的重要原因，惟有兩者兼備，才稱得上是「精校精鈔」。上海秦嘉楫，亦懷抄書癖嗜。他精通書法，自幼即喜好抄書，居官亦然，以是家藏「手鈔書甚多。嘗見《吳冢志》三卷，楷法學吳興，卷尾八分小字二行尤工。宋幼清懋澄題其後曰：

[92] 明·陸深，《嚴山集·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3），卷51〈為己方序〉，頁5。

[93] 明·牛若麟等，《崇禎·吳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47，頁47。

[94] 明·張大復，〈顧天竣傳〉，《吳郡張大復先生明人列傳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據國家圖書館藏方氏清稿本清康熙間編者手稿本影印），頁310。

[95] 《明分省人物考》，卷22〈南直隸蘇州府五〉，頁45。

[96] 《靜志居詩話》，卷8，頁676。

『此秦侍御手書，蓋先輩之惓惓於文獻者。』按所書年月隆慶壬申（六年，1572），是入御史臺後筆。」^[97]而吳縣錢允治，為抄書名家錢穀之子。錢穀楷法雅致，後世稱為「錢抄」，錢允治「貧而好學，饒有書名，能世其家學。年八十餘，隆冬病瘍，映日鈔書」，^[98]也以書法聞名於世。

至於天生懷抱抄書癖的文人，明代江南地區更是所在多有。他們往往將抄書融入生活當中，時時品味其中樂趣而至老不悔。吳縣文人閻起山，篤好抄書與聚書，竟至不問貧病。其友文徵明述其事云：「喜積書，見書必力購求。家惟一僮，日走從友人家借所未讀書，手抄口吟，窮日夜不休。所獲學俸，盡費為書資。家甚貧，或時不能炊，至質衣以食，而玩書不忍棄。竟以積勞得羸疾，家用重困。余以其貧且病，數諷止之。雖時頷余言，然終不能改也。」^[99]同縣文士盧襄，素好抄書，「雅性喜學，家居時，每得異書，輒手自繕錄，既仕益勤。雖簿領雜襲，而不廢佔畢。」^[100]正德年間，吳縣文人柳僉號稱「吳門柳氏藏書」，^[101]今由其跋《錄異記》一書中，可以略窺柳氏的抄書生活，跋云：^[102]

得于友人家，假歸錄出，仍鈔別本，總計七十翻。時正德己卯（十四年，1519）三月望後一日，吳門柳僉大中錄畢于桐涇別墅之「清遠樓」中。其日細雨，閉門弄筆，強述一章以紀之：「鈔書與讀書，日日愛樓居。窗下滿地水，萍間卻餌魚。時名隨巧拙，天道已盈虛。莫信村居好，山居樂有餘。」

柳僉的抄書生活充滿閒情雅致，搭配讀書、園林、山居、習靜等活動，為明代江南文人生活增添一筆風雅典型，其樂淘淘。

崑山藏書家沈果（1521-1562），時人述其抄書生活云：「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為迂。貞甫獨於書之

^[97] 清·應寶時等，《同治·上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據清同治11年刻本影印），卷32〈雜記三·遺事〉，頁15。

^[98] 〈丁集中·錢處士穀〉，《列朝詩集小傳》，頁487。

^[99] 《文徵明集》，卷29《亡友閻起山墓志銘》，頁675。

^[100] 《文徵明集》，卷34《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盧君墓表》，頁770。

^[101] 《讀書敏求記》，卷4〈沈雲卿集二卷〉，頁143。

^[102]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4〈錄異記八卷〉，頁168。

好之如此，蓋方進于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103]沈果篤於所癖，至情至性而不隨流俗。長洲文人王穀祥（1501-1568），生「有書癖，所抄錄古文籍至數百千卷，咸精好，令人不忍觸手。」^[104]性好習靜，不問塵世，「杜門卻掃，焚香而坐，一室之內，琳琅金薤，謐如也。」^[105]常熟文人何大成（？-1643），「負氣忤俗，不容於閭里。避仇，出游黔楚間，歸益嗜書好古。每聞一異書，徒步訪求，篝燈傳寫，雖寒凍不少休。」^[106]嘗作詩云：^[107]

吾儕眞書淫，餘事了游癖。既理支硎棹，旋放天平屐。自惟老腳硬，尚堪年少敵。登登及山椒，千步始一息。憑高一以眺，萬木靜如拭。湖光浩渺平，山容逶迤出。憶昨「小宛堂」，抄書忘日昃。手如蠶食桑，心似蜂營蜜。今朝始畢功，探奇何孔棘。蠅營滿天地，此樂無人得。游山擬爲樵，蒐書甘作賊。幸茲江南安，二事乃吾職。

何氏鍾情抄書，復雅意山水，寓「書癖」與「遊癖」於生活之中，至老不疲，自稱：「抄書與游山，此樂可忘死」^[108]，展現出明代江南文人性格率真的一面。同縣的馮舒與馮班兩兄弟，更因篤嗜抄書而遭時人目爲癡絕。《第六絃溪文鈔》記云：^[109]

馮己蒼（馮舒）昆仲，聞寒山趙氏（趙宦光）藏有宋槧本《玉臺新詠》，未肯假人。嘗于冬月，挈其友艤舟支硎山下，于朔風飛雪中，挾紙筆，袖炊餅數枚，入山逕造其廬，迺許出書傳錄。墮指呵凍，窮四晝夕之力，抄副本以歸。旁人笑爲癡絕，不顧也，時傳爲佳話。

明末長洲文人顧韓（1615-約1700），本爲諸生，鼎革後謝去，「於世事無所好，而性獨好書，聞人有善書，必多方購得之。其未板行而隱秘者，求之益力。或書帙重，非力所能得，則手自鈔錄，窮日夜可盡百十紙。夜嘗不寐，寐

^[103]《震川先生集》，卷19《沈貞甫墓誌銘》，頁473。

^[104]《皇明詞林人物考》，卷9，頁376。

^[105]明·文震孟，《姑蘇名賢小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藏光緒8年長洲蔣氏心矩齋校刊本），卷下〈王吏部先生〉，頁15。

^[106]《明詩人小傳稿》，卷5，頁178。

^[107]清·馮舒，《懷舊集》（臺北：明文書局，1985.5），卷上〈同馮己蒼昆季入寒山抄玉臺新詠畢遂游天平〉，頁319。

^[108]《懷舊集》，卷上〈次日蚤起別趙靈均從放鶴亭至觀音寺落舟〉，頁319。

^[109]清·黃廷鑑，《第六絃溪文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6，據後知不足齋本排印），卷2〈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頁36。

亦止盡數刻，張燈披衣，往往達旦。手不釋卷，不停鈔，自以為愉快極，雖老至不知也。」^[110]

有些明代江南地區的文士在抄書時，還會使用個人專屬格式的紙張來謄寫。一般而言，名家抄書多半會先刻印匡欄行格，並且在版心處或格欄外，標其齋室名稱，然後再自行抄寫，或倩人代抄。有匡欄則有一定之範圍，便於抄錄及校勘。^[111]無錫文人姚咨，喜好手抄古籍善本，家藏《南唐書》，乃「從洛川張氏抄本手錄，蓋出自宋本也，葉心有『茶夢齋鈔』四字。」^[112]這也是明代江南文士抄書的一個特殊風格。

(三) 促進著述與創作風氣

必須特別說明一點，古代藏書家抄書的方式大致有三種：一為親自抄錄；二為僱人代抄；三為委託親朋好友或是家中僮僕代抄，這些方法都因人因書而異。^[113]為迎合廣大市場的人力需求，明代江南地區還出現一批專門以抄書為業的文人，稱為「傭書」或「書傭」。另一方面，由於當時學者們也喜歡抄書，彼此互相借閱傳抄，成為學習上的一種樂趣^[114]，甚至轉變為文士們著述與創作的方式，例如知名文士袁中道（1570-1624）某日讀《稗海》，便曾經按照不同的主題，命人分別抄成三部，他說道：^[115]

閉門閱《稗海》，命小童及一傭書者隨閱隨抄。可效法者為一集，事關因果助發道心者為一集，救妄者為一集，可懲戒者為一集。

以上引文中的「小童」及「傭書者」，就是替袁中道抄書的兩種人，經過他們的重新整理，袁氏再行閱讀，助其自學。

此外，許多文士本來就喜歡一邊讀書，一邊抄錄，有些人還會順便寫下心得，透過這樣的方式，也可以成為文人的一種著作方式，稱為「抄撰」。「抄撰」是古代的重要著作方式之一，也就是邊抄邊撰，抄撰一體，抄中有撰，撰

^[110] 清·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臺北：明文書局，1985.5），卷8，頁136。

^[111] 《古書版本鑑定研究》，頁263-264。

^[112]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再版（臺北：廣文書局，1989.7），卷10〈南唐書三十卷〉，頁20。

^[113] 同註3。

^[114] 《古籍版本概要》，頁115-116。

^[115] 明·袁中道，《游居柿錄》（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12），卷7，頁151。

在其中，由此可知，抄書就是著書。^[116]譬如上海藏書家陸深，便以「抄撰」的方式，撰成《金臺紀聞》一書，當中就寫道：^[117]

古書多重手抄，東坡（蘇軾）於〈李氏山房記〉記之甚辨。比見石林（葉夢得，1077-1148）一說，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882-954）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鑄者亦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其說殆可與坡並傳。

上文引號之內，便是陸深抄自宋人葉夢得的作品，而引號之外，則爲陸深個人的心得，類似這樣的作法，匯集起來，就成了一本書，也就是「抄撰」，爲明代文人著書時慣用的作法。另外，抄書又是考證的一種基本功夫，文人作文既要言必有徵，就不能不博覽，亦不能不抄書。^[118]所以，明代江南文士讀書時，很多人喜歡抄書，並且以抄書做爲幫助閱讀與記憶的方法。又如秀水文人陳泰甯，也好以抄書來進行創作，自「少博學，遇異書，輒手自鈔寫，積數十冊」^[119]，也是「抄撰」的另一佐證。

抄書既多，識見益廣，明代江南許多文人因而發爲著述，成就風雨名山之業。嘉定文人浦杲，「少孤貧好學，長益刻厲。聞未見書，必力購得之，或手抄以讀，窮日夕不厭，故其學多所該識，然惟資以爲文，不事進取。」^[120]抄書與著述，成爲浦杲生活中的主要寄託。明清之際，吳縣文人金俊明（1602-1675），獨以抄書癖嗜爲活，逃避當時無力回天的末朝亂世。少補縣學生，累舉不利，「遂不終試而歸。歸即謝諸生，杜門以傭書自給，是時明猶未亡

[116] 曹之，〈古代抄撰著作小考〉，《河南圖書館學報》，19：2（1999.6），頁25。

[117] 明·陸深，《嚴山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3），卷8〈金臺紀聞下〉，頁6。

[118] 嵇文甫，〈晚明考證學風的興起〉，《鄭州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3（1963），頁2。

[119] 清·許瑤光等，《光緒·嘉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8，據清光緒5年刻本影印），卷53〈秀水文苑〉，頁39。

[120] 明·張昶，《吳中人物志》（臺南：莊嚴文化，1996.8，據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4年張鳳翼等刻本影印），卷9，頁26。

也。」^[121]鼎革「亂後，隱市廛間，矮屋數椽，藏書滿櫝。」^[122]「平生好錄異書，靡閒寒暑」^[123]，運筆「悉有法度，晚益自名一家。其激昂奇偉之材與傲兀不平之氣，不得已寓諸書畫間。」^[124]金氏憑藉精善的楷法，透過抄書的工作廣為著述，《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載云：^[125]

既善書，平居繕錄經籍祕本，以訖交游文稿，凡數百種，無不裝潢成帙，度置膝鐫惟謹。……老屋數間，塵埃滿案。與客清坐相對，久之自起，焚香淪茗，稍出其書畫與所錄者，娛客而已。

同縣的何名世，也是如此。「衰老，傭書為業。恥與富貴者往來，每閉關靜坐。雞鳴，以粥湯二甌為嘗膳，午後繼以糲飯。朝親筆硯，寫必成部，逮燈下則默看典籍，終日歡如也，不知其為困約。有詹把總者，欲抄一書奉權貴，凡精於繕寫者皆不中，厥心讀嗜名世老筆，令人邀至其寓，辭焉，曰：『傭書矣！而又曳袂侯門耶？』終年僦屋，門有一聯云：『陋巷單瓢顏子志，殘編斷簡鄴侯書。』名世多積書，皆卷帙簡少者。」^[126]何氏閉門抄書，寫必成部，雖說藉此聊慰不平，然其安貧樂道的高尚行徑，更足為此際江南文士逸世遁隱生活的表率。

四、結 論

在古代通訊、交通俱不發達的條件下，透過許多人的輾轉傳抄，一本書不但可以化身千萬，還能夠跨越時空的阻隔四處傳播。從借抄方面來看，明代江南地區很多文士都借抄過書籍，有些人借抄過的書本更是數以千計。他們或抄自官府，或源從私家；或親自動手，或請人代勞，幾乎都是千方百計，孜孜以求。借抄的目的或許僅是單純地為了增加自己的藏書，但成百上千的文士經年累月的抄寫，無數雙抄書的手匯合起來，有如開動一架永不停歇的印書機，源源不斷地為中國古代典籍生產出無數的副本^[127]，其歷史與文化功績，自不待言。

[121]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5），卷476〈隱逸十六〉，頁610。

[122] 清·徐鼐，《小腆紀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5），卷58〈逸民〉，頁663。

[123] 《靜志居詩話》，卷21，頁243。

[124] 馬宗霍，《書林藻鑑清代篇》（臺北：明文書局，1985.5），頁66。

[125]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476〈隱逸十六〉，頁611-612。

[126] 《崇禎·吳縣志》，卷49，頁12-13。

[127] 蕭東發等，〈中國古代的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圖書與資訊學刊》，32（2000.2），頁50-51。

明代的圖書印刷事業雖已相當發達，但是許多書籍仍然得之不易，因此文士們非常重視抄書，甚至蔚成時尚與生活特色。明代江南士人的抄書活動對於今日全民閱讀運動的啓發，不但可以注入新的力量，開發新的趨勢，更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區域文化命題。由於明代江南文士普遍喜歡抄書，彼此間互相借閱傳抄，不但保存暨流通古代典籍、傳播知識與文化、促進著述和創作、精進書法的藝術，甚至也可滿足自我癖好，成為文人生活文化的一種時代面向。

參考文獻

(一) 古籍

- 明·文徵明。《文徵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明·文震孟。《姑蘇名賢小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藏光緒8年長洲蔣氏心矩齋校刊本）。
- 明·王兆雲。《皇明詞林人物考》（臺北：明文書局，1991.10）。
-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北京：現代出版社，1986.11，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11）。
- 明·呂留良。《呂晚邨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3）。
-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12）。
- 明·李日華。《恬致堂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1.10，據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
- 明·姚士粦。《見只編》（臺北：新文豐，1985.1）。
- 明·郎瑛。《七修類稿》（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8）。
- 明·袁中道。《游居柿錄》（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12）。
- 明·張大復。《吳郡張大復先生明人列傳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據國家圖書館藏方氏清稿本清康熙間編者手稿本影印）。
- 明·張昶。《吳中人物志》（臺南：莊嚴文化，1996.8，據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4年張鳳翼等刻本影印）。
- 明·曹溶。《流通古書約》（臺北：興中書局）。
- 明·曹溶。《學海類編》第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
- 明·陳繼儒。《白石樵真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陳繼儒。《妮古錄》（臺北：新興書局，1976.8）。
- 明·陳繼儒。《岩棲幽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118（臺南：莊嚴文化，1995.9，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影印）。

- 明·陳繼儒。《書畫史》（臺北：新興書局，1970.7，據明刻本影印）。
- 明·陸深。《金臺紀聞》（臺北：新興書局，1974.7）。
- 明·陸深。《儼山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88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3）。
- 明·陸深。《儼山集·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20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3）。
-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1，據國家圖書館藏善本影印）。
- 明·焦竑。《澹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5）。
-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臺南：莊嚴文化，1997.6，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44年黃汝亨朱之蕃等刻本影印）。
- 明·黃宗羲。《思舊錄》（臺北：隆言出版社，1969.10）。
- 明·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臺北：明文書局，1991.10）。
- 明·趙用賢。《松石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趙琦美。《脈望館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1）。
- 明·鄭敷教。《桐菴文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藏民國6年崑山趙詒琛刊本）。
- 明·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3版（臺北：世界書局，1985.2）。
- 明·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
-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臺北：源流出版社，1983.4）。
-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11）。
- 清·丁申。《武林藏書錄》4版（臺北：世界書局，1980）。
-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12）。
-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臺北：明文書局，1991）。
-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再版（臺北：世界書局，1989.4）。
- 清·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臺北：明文書局，1985.5）。
- 清·吳德旋。《初月樓續聞見錄》（臺北：明文書局，1985.5）。
-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5）。
- 清·汪琬。《堯峰文鈔》（上海：上海書店，1989.3，據林佶寫刊本影印）。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4版（臺北：世界書局，1989.11）。
- 清·孫從添。《藏書紀要》（臺北：新文豐，1984.6）。
- 清·徐鼐。《小腆紀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5）。
- 清·馮舒。《懷舊集》（臺北：明文書局，1985.5）。
- 清·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8）。
- 清·黃廷鑑。《第六絃溪文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6，據後知不足齋本排印）。

- 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4版（臺北：世界書局，1980.10）。
-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12）。
- 清·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臺北：國家圖書館，1986）。
- 清·盧世澐。《尊水園集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刻17年盧孝餘增修本影印）。
-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6）。
-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再版（臺北：廣文書局，1989.7）。
- 清·顧廣圻。《百宋一廬賦》4版（臺北：世界書局，1980.10）。

(二) 方志

- 明·牛若麟等。《崇禎·吳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12，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王鏊。《姑蘇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12，據明正德刻本影印）。
- 明·姚宗儀。《常熟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藏明萬曆間刊本）。
- 清·許瑤光等。《光緒·嘉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8，據清光緒5年刻本影印）。
- 清·鄭鍾祥等。《常昭合志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藏清光緒30年活字本）。
- 清·應寶時等。《同治·上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1，據清同治11年刻本影印）。

(三) 專書

-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1）。
- 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1）。
- 李清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9）。
- 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
- 周少川。〈元代的私家藏書〉，《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第2期。
- 馬宗霍。《書林藻鑑清代篇》（臺北：明文書局，1985）。
- 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臺北：洪葉文化，1994.11）。
- 陳宏天。《古籍版本概要》（臺北：洪葉文化，1992.10）。
- 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6.10）。
- 陳冠至。《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2.2）。
- 陳登原。《中國歷代典籍考》（臺北：五洲出版社，1968.9）。
-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2）。
- 葉樹聲等。《明清江南私人刻書史略》（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5）。
- 劉兆佑。《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臺灣書店，1997.6）。
-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5）。

(四) 期刊論文

- 王建國。〈明代北京的民間抄書活動〉，《北京社會科學》，2004：3，頁42-46。
- 王偉凱。〈明代圖書的國內流通〉，《社會科學輯刊》，1996：2，頁105-109。
- 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1996年第1期（1996.6），頁101-118。
- 昌彼得。〈談善本書〉，載於：氏著，《版本目錄學論叢（一）》（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頁1-20。
- 邱澎生。〈明代蘇州營利出版事業及其社會效應〉，《九州學刊》，5：2（1992.10），頁139-159。
- 封思毅。〈歷代寫本概述〉，載於：吳哲夫主編，《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臺北：中國圖書館學會，1985），頁286-300。
- 柳作梅。〈牧齋藏書之研究〉，《圖書館學報》，5（1963.8），頁77-84。
- 袁同禮。〈明代私家藏書概略〉，載於：洪有豐，《清代藏書家考》（香港：中山圖書，1973），頁73-80。
- 袁逸。〈中國古代的書價〉，《圖書館雜誌》，1991：4，頁53。
- 張木早。〈中國古代私藏典籍的收集〉，《中國圖書館學報》，1996：4，頁43-48。
- 曹之。〈古代抄撰著作小考〉，《河南圖書館學報》，19：2（1999.6），頁25-26。
- 陳益君。〈淺論中國藏書樓的歷史變遷與文化價值〉，載於：黃建國等主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386-394。
- 嵇文甫。〈晚明考證學風的興起〉，《鄭州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63：3，頁1-8。
- 楊柏榕等。〈關於中國古代藏書家評價問題〉，《四川圖書館學報》，1991：2，頁60-64。
- 葉樹聲。〈明代南直隸江南地區私人刻書概述〉，《文獻》，1987：2，頁213-29。
- 劉尚恒。〈樂宜偕衆，書不藏家——國古代私家藏書的流通〉，《四川圖書館學報》，1992：4，頁71-76。
- 劉意成。〈古代私人藏書家對保存圖書文獻的貢獻〉，《贛圖通訊》，1983：4，頁32-35。
- 劉意成。〈私人藏書與古籍保存〉，《圖書館雜誌》，1983：3，頁60-61、47。
- 蕭東發。〈印刷術發明後的抄寫本書〉，《贛圖通訊》，1983：3，頁52-57。
- 蕭東發等。〈中國古代的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圖書與資訊學刊》，32（2000.2），頁45-54。
- 韓文寧。〈明清江浙藏書家的主要功績和歷史局限〉，《東南文化》，1997：2，頁141-144。

The Scribing Lifestyle of Jiang-Nang Literatus in Ming Dynasty

Kuan-chih Chen

Abstract

The scribing was the popular way for ancient book collectors' acquiring and collecting books in the Sung Dynasty, Yuen Dynasty, Ming Dynasty, and Ching Dynasty. The literatus was used to scribing in order to enhance memory. The manual transcribing, therefore, would never be abolished even after the invention of engraving. Furthermore, the scribing had been a fundamental method of studying, self-learning, document arrangement, and the major interface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communication and circulation. The literatus Min Dynasty's literatus regarded scribing as important and became characteristics of fashion and lifestyle although the printing technique had been developed. The scribing activity of Jiang-Nang literatus has enlightened the public reading campaign nowadays, and it is also a significant issue of regional culture. Due to the scribing was popular in Ming Dynasty, the ancient books were reserved, knowledge and culture were disseminated, compiling and creative writing were promoted, and finally the scribing became the lifestyle. The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the above dimensions.

Keywords : Ming Dynasty ; Jiang-Nang ; Literatus ; Scribing ; Lifestyle

Kuan-chih Chen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E-mail: dhau@ms35.hinet.net

